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外国史学史

王晴佳 李隆国 著



A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round the Worl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外国史学史

A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round the World



王晴佳 李隆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史学史 / 王晴佳, 李隆国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28302-8

I. ①外…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史学史—世界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1041号

- 书 名 外国史学史
WAIGUO SHIXUESHI
- 著作责任者 王晴佳 李隆国 著
- 责任编辑 陈 甜 李学宜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302-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pup@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8印张 373千字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6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谨以此书献给北大张芝联先生(1918—2008),怀念他
对国外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开创性贡献!

序 言

鉴往知来,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古今中外,少有例外。史学史的学习,则是为了考察和总结历史研究的经验教训,以求其在将来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历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目的颇为相似。可有趣的是,虽然历史学家为人类历史保存了许多记忆,但他们对自己从事的领域却较少注意。更确切地说,史家开始考察、总结历史学演变,往往在历史学诞生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以中国史学为例,汉代司马迁、班固及汉之后的范曄和陈寿所著的历史,被后人称为“前四史”,誉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但对他们史学经验的总结和反省,直到唐代的刘知几所著的《史通》方有比较系统的尝试。从司马迁到刘知几,相隔有八百年之久。在刘知几之后,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另一部堪称“史学史”的作品。而从刘知几到章学诚,相隔又有一千余年了。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史学也同样源远流长,如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与孔子生活于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希罗多德之后,西方史学传统中名家辈出,但比较系统的一部史学史著作,则要到16世纪才出现——法兰西人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 1541—1608)写出了第一本冠名《史学史》(*L'histoire des histoires*)的著作。他像刘知几一样,从著史体裁的变化来总结以往历史著述的演变。而从希罗多德到拉·波佩利尼艾尔,其间经过了二千年之久。

看来史学史的开展晚于历史学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或许有人会说,这一现象说明史学史之于历史研究,似乎不甚重要。但事实则是,如果我们稍微细究一下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则恰恰有助于展现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和必要,因为史学史著作的出现,通常是在历史研究经历重大转向之后的产物。还以刘知几为例,他所处的唐代与前代相比,历史著述出

现了重大的转变,从私家修史转向设官局修史。刘知几本人亦曾在唐朝的史馆任职,而史馆修史虽然在唐代以前便出现,但是到唐代才确立为一项制度,不但在中国为后来的历朝所遵照执行,而且也为邻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朝廷所接受,成为东亚史学的一个特色。同样,16世纪欧洲的拉·波佩利尼艾尔有意写作史学史,也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欧洲史学正经历从中古到近代的转型。那时不但出现了史学史的论著,而且还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作品问世。如拉·波佩利尼艾尔同时代的法兰西同胞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便写出了《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一书,为这一领域最早的论著之一。

在中西两大史学传统之外——更确切地说是在中西史学之间——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也创造了丰厚的史学传统。同样,史学史的研究也在中东史学转折的时刻出现,而且还与唐代刘知几写作《史通》的契机颇有一些可比之处。中东史学宗教色彩浓厚,早期史学著述主要记述被奉为先知的默罕默德的言行及其丰功伟绩。但在14世纪之后,突厥人崛起并渐渐转聚成了奥斯曼帝国,而在伊朗则有远承萨珊王朝的萨菲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抗衡。这些政权都相继皈依了伊斯兰教,扩充和扩展了穆斯林史学的传统。也许是为了汲取有益的历史教训,萨菲王朝时期的史学,相对比较发达,如冠之以“君主之鉴”作品的创作,数量众多,成为波斯史学的一个特色。由此开始,中东史学也逐渐建立了官方修史的传统,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中国传统史学在唐代的转折。因此,被誉为穆斯林天才史家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 1332—1406)在14世纪写出《历史绪论》(*Muqaddimah*)这样一部兼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著作,便非偶然。几乎同时,官方修史的传统也渐渐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于是,15世纪有奥斯曼史家穆斯塔法·阿里(Gelibolulu Mustafa Ali, 1541—1600)写作的《历史要籍》(*Künhü'l-ahbar*)一书,系统总结穆斯林史学的传承与演变。

西方史学之走向近代化,是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变化的重要阶段,因

为在此之后的二百年中,各地的史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也不例外,相关论著已有多种。^①值得重视的是,史学史的系统研究,抑或史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建立,也在史学近代化后的西方形成和确立了。许多人都认可西方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在19世纪之初,德意志史家路德维希·瓦克勒(Ludwig Wachler, 1767—1838)写有《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研究和艺术史》(*Geschichte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 und Kunst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litterarischen Cultur in Europa*),似乎预示了历史学即将走向发达。而19世纪甫一结束,瓦克勒的同胞爱德华·富艾特(Eduard Fueter, 1876—1928)便出版了《近代史学史》(*Geshichite der neuren Historiographie*),成为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不过在英语世界更为著名的当属G. P. 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 1873—1968)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书与富艾特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从题目到内容都更为突出了19世纪为“历史学的世纪”这一西方学界共识。在此之后,史学史的著作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而一般言之,都以总结和概括西方近代史学模式之形成和影响为宗旨。

历史学的转向导致史学史研究的兴盛,那么反过来,研究史学史则有助我们了解历史学发展的现状、动向和前景。这是所有历史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功,也是我们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但史学史著作的写法,颇为多样。上面所举的种种先例,个个不同,各有特色。而我们写作此书,也尝试展现我们自己的特点。大致而言,与目前流行和使用的同类作品相比,本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如同本书书名所示,我们的写作内容虽然还是以西方史学的演变为主,但涵括了西方以外的地区,因此

^① 如张广智曾写有相关的多篇论文,介绍西方史学如何传入近代中国,如《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上、下,《史学理论研究》,1996,第1、2期。杜维运写有“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收入氏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1981),287—336页。近年李孝迁有题为《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专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外国史学史》的书名更能反映本书的实质,也突出了本书与坊间已有教材的不同。我们有此选择,不仅因为作者之一曾参与写作《全球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翻译出版),且全球史观已经成为当今史学界的主潮,更因为中国史学界也急需扩展学术视野,不只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也超越中西比较的二元对立思维,注意到其他非西方地区的文化及其与中国史学的相似、可比之处。以历史学的近代转型而言,由西方开始逐渐蔓延于全世界,但各个地区在引进和吸收西方近代史学模式的同时,又对之加以取舍和改造,其中有相当有益的信息,值得我们历史系师生参考借鉴。近年世界范围的史学潮流一变再变,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便由印度、印裔学者领头,对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发起有效的挑战,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史学团体中产生了共鸣。简言之,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在近年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而全球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世界各个文明之间产生了频繁互动和多重联系。历史学中全球观点愈益重要,亦是全球化扩展的一个写照。但如上所述,本书的内容仍然以西方史学的变迁为主,其中原因是考虑到中国各大学历史系课程设置仍然以“西方史学史”居多。不过,通过扩大本书的内容,我们希望能抛砖引玉,逐步扩展学生的视野,让他们采纳更新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和历史学的变化。

其次,本书在内容上不但希求走出西方中心的窠臼,同时也注意反映学术界最新的成果,特别是引领全球范围史学变化的新潮。从架构上来看,本书厚今薄古,对近代以来的史学变迁着墨较多,更注意 21 世纪以来史学界出现的种种新动向。如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当代史学的走向”,篇幅最大,目的是让读者领略当代史学界的最新趋势。如果说鉴往知来是中国人对历史学的期望,那么西方史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如著有《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的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就曾形容历史学是“过去和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其表达的意思是希望历史研究和写作能与现实、现世充分沟通与交流,方能提供有益的资鉴。史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也同样有此目的——

我们希望本书能有效反映当今史学的走向,因为了解现状是预知未来的有效方法。一言以蔽之,本书与其他类似著作相比,其包含的内容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要相对宏阔和时新一些。

复次,自19世纪以来,史学史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关论著不时出版,更新了我们对历史学这一学科的总体知识。一般的史学史著作,常常采取“点将录”的形式,历数历史上的史学名家,交待他们的生平、学术和著作。这些内容自然而且已经是史学史研究的重点。但本书的写作,在上述内容之外,更希求呈现历史学演变的背景和原因。如果历史学是过去与现实不断的对话,那么史学形式的更新,新的史学思潮、观念和方法的出现,往往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各种各样的背景。揭橥这些背景、解释变化的原因、探究历史变动与史学变迁的种种联系是本书着力较多的部分。我们也希望通过描述和分析这些背景和原因,能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历史学的性质和史学史的功用。

最后,本书的宗旨是为大学历史系的史学史课程讲授提供一部简明易读的教材。我们的写作风格,希望能达到这一目的。换句话说,虽然本书处理的内容对普通大学生来说,相对有些陌生,不但有众多外国人名,还牵涉各种文字的书名,但我们自忖没有故弄玄虚,更不想虚张声势,以旁征博引来显示学问。相反,我们的行文力求朴实简练,引证也尽量简化,不让读者负重太多。当然,本书是否落实了我们的初衷,还有待读者的检验和同行的认可。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衷心期待着!

王晴佳 李隆国 谨识

2016年1月23日

目 录

序 言/1

第一章 西亚北非的历史写作/1

第一节 “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的大史学传统/1

第二节 古代西亚史学撰述/4

第三节 古代埃及的史学/14

第四节 犹太史学/20

第二章 古典希腊史学/22

第一节 西方“史学之父”与史学的发生/23

第二节 历史考据的新机制/30

第三节 历史之用与色诺芬的教导/37

第四节 希腊化时期的史学/41

第三章 罗马史学/46

第一节 “修辞压力”与罗马早期史学的艰难成长/46

第二节 共和国的没落与罗马的衰亡/52

第三节 罗马的扩张与世界史的繁盛/57

第四节 罗马帝国与帝王史学/61

第五节 基督教史学的兴起/69

第四章 中古史学的形成/78

第一节 希腊语史学/79

第二节 拉丁欧洲的史学/89

第三节 阿拉伯文史学的兴盛/104

第五章 中古史学的流变/113

第一节 拜占庭、东欧史学/114

- 第二节 伊斯兰史学/121
- 第三节 俗史与圣史竞逐下的中欧、西欧史学/128

第六章 史学近代化的初始/149

- 第一节 “走下神坛”的史学/149
- 第二节 历史与政治/156
- 第三节 历史是什么? /161
- 第四节 宗教改革与修史热潮/168
- 第五节 民族史的雏形/172

第七章 近代史学的建立/181

- 第一节 博古学与历史学/181
- 第二节 传统史学的终结/186
- 第三节 历史哲学的兴起/191
- 第四节 吉本与启蒙史学/199

第八章 民族史学与科学史学/212

- 第一节 民族国家与民族史学/212
- 第二节 科学史学的兴起/219
- 第三节 发现历史规律/228
- 第四节 学派的传承与演变/236

第九章 历史主义的危机/246

- 第一节 德国的“方法论”论争/246
- 第二节 美国的“新史学”/252
- 第三节 战争与革命/263
- 第四节 扬弃历史主义/270

第十章 近代史学走向全球/281

- 第一节 中东伊斯兰史学的传统与更新/282

第二节 塑造印度的民族史/289

第三节 东亚史学的革新/295

第四节 拉美和非洲史学/305

第十一章 年鉴学派及其影响/311

第一节 斯特拉斯堡大学与“年鉴精神”的孕育/314

第二节 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的划时代成就/318

第三节 从计量史学到(新)文化史/323

第十二章 自下而上的历史/331

第一节 从结构史到叙述史/33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史/336

第三节 从社会科学史到日常生活史/343

第四节 心态史和微观史/349

第十三章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与现代史学/355

第一节 海登·怀特的“革命”/355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浪潮/360

第三节 《东方学》与后殖民主义批评/368

第四节 下层研究、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373

第十四章 当代史学的走向/380

第一节 后现代观念的深化和内化/381

第二节 从理性到感性:情感史的研究/386

第三节 “新史学”的扩展:新文化史和历史记忆/393

第四节 走向“大历史”:全球史和环境史/401

推荐阅读书目/414

索 引/420

第一章

西亚北非的历史写作

第一节 “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的大史学传统

史学的起源与史学的发生是彼此关联但又不同的问题。起源研究是针对史学要素而言,追溯这些要素最初的痕迹。例如,书写的发生,求真意识的出现,等等。而史学的发生,则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出现于某部历史著作中。此后经过时间的考验,该史书成为典范,使得历史写作从此有了传统可循。这部作品的作者往往被称为“史学之父”。中国古代学者并不习惯用“史学之父”这个称谓,但现代西方史学传入之后,学者们借鉴西方的学术习惯,也来“发现”中国的“史学之父”。有人说是孔子,有人则认为是左丘明,也有人主张司马迁才是实至名归的“史学之父”。在西方,公认的“史学之父”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

既然有了“史学之父”,那么这位史家之前的历史写作,就往往只能是史学的“史前史”了。在流行的史学史论著中,希罗多德之前的史学,尤其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史学,就被当作西方史学的起源部分来讲述。在某种程度上,这两地的史学不过是在为西方史学的“伟大发生”作准备活动。似乎古代西亚北非几千年的历史创作,只是在为西方史学的发生提供各种要素。而使这些要素综合起来,从而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只有通过希腊人的史学创作才得以实现。

但是，“史学之父”的称号是后来人论述史学史的时候所使用的，没有人自称为“史学之父”。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的最早文献证据，来自于西塞罗的《论法律》（残篇），那时距离希罗多德有400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史学之父”的称谓反映了400年之后，西塞罗对希罗多德的史学开创性的认同。西塞罗认为，当时流行的历史学之基本特征，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已基本具备。换言之，希罗多德是“类己”的最早史家。通过使用“史学之父”这个称谓，西塞罗彰显了罗马学者的史学认同标准。实际上随着当下的改变，这个判断的标准——基本特征——也在改变，因此，对于谁应该获得“史学之父”的桂冠，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倾向的学者也会有各自的认识。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学者并不认可希罗多德是“史学之父”，而是认为以色列的摩西（Moses，约公元前12世纪）为第一位史家。即使在非基督徒中，希罗多德也不再被认为是“史学之父”，这个桂冠被授予给弗里吉乌斯（Dares Phrygius，约公元前7世纪），因为他创作了反映特洛伊陷落之后欧洲诸族群迁徙活动的史诗。^①可见中古时期对于史学作品的认定标准，又与古代不尽相同。有些现代史学家认为希罗多德的作品不够科学，所以又授予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科学史学之父”的称号。“史学之父”称号的运用最为集中地反映了使用者的史学评价标准。

中国人认为有四大文明古国，其中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文明似乎要更早一些。其实，西方学者的世界历史，也往往从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开始讲起。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历史书写出现甚早，往往位于史学史教材的开篇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史学史家又并不怎么重视这段历史。尤其是与后来的希腊史学相比，古代西亚北非的史学作品不仅神人不分，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完整的历史情节，对历史的认识也比较粗浅。因此被认为是“准史学”或者“原史学”。直到希腊

^① W. M. Lindsay ed., *Isidor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 Lib. I., p. xlii.

史家吸收了他们的史学文化成果之后,才开创性地发展出了历史学。本书不拟采用这种从原始到高级的进步史观,而是将东至印度河,西至直布罗陀海峡的地域当做一个整体,称为“亚非欧小世界”“亚非欧交叉地带”或者“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

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与黑海,将古代两河流域、北非和南部欧洲连贯起来,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尼罗河文化、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和罗马文化彼此互动,在互相模仿的同时,也在竞争中创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远大于彼此的隔绝,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世界。早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献中,就经常提到这个世界,“从前海到后海”,前海即波斯湾或阿拉伯海,后海即地中海。这是当时人所知的世界,一个长期存在的文化生态区。

从时间上讲,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历史记述出现得相对较早,也彼此影响,它们又共同影响了古代希腊史学和犹太历史撰述。反之亦然。所以,希罗多德认为埃及是最早、最重视历史记忆的国度。而在中古时期,史学史家又认为犹太史学不仅早于希腊史学,而且犹太人的历史也要比古代埃及和巴比伦更为久远。个中是非暂且不论,这些竞争性的说法,本身就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彼此不能分离。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公元前6世纪,波斯称霸于这一地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时期,希腊诸王国也在这一地区肇建。及至公元前2世纪,埃及、叙利亚和希腊先后从属于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之下,此后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长期争夺“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的霸权,互有胜负。彼此的史学也各为其主,互相角力。罗马帝国晚期,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首都,号称“新罗马”。帝国重心东移,更加彰显了这个世界的整体性和重心之所在。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I, 272—337)的这一决定是顺应时代需求的。此后西部地区遭到忽略,蛮族王国纷纷在此建立,但这些王国都长期遥尊君士坦丁堡为最高政治和文化权威。而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的兴起,则剥夺了罗马帝国对北非和大部分小亚细亚地区的统治,并对君士坦丁堡所代表

的罗马帝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9世纪以后,虽然有局部的战争,但是,大局相对稳定,基本上形成拉丁基督教文化、希腊东正教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三家鼎立的格局。三个亚文化区的历史叙事各自不同,彼此较劲。伊斯兰学者往往只是将耶稣当作众先知之一,而中古基督教史书往往说默罕默德是“思想骗子”。但三个地区的史家在叙述人类历史的时候有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在叙述古代历史部分的时候,都以《圣经·旧约》的犹太人历史为核心。他们自身的历史和现在,则是对犹太人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过去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渊源大体一致,而流别各自不同。

到11世纪末,这个世界的核心地区——小亚细亚再次成为三方角力的主战场,发生了所谓“十字军运动”。这场旷日持久,长达几百年的战争,以伊斯兰突厥人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告一段落。此后几百年间,虽然教皇不断地号召新的十字军运动,但基本上延续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略占优势的国际均势状态。直到17、18世纪,长期处于相对弱势的欧洲西部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才根本性地改变了实力对比,颠覆了这一延续千年的国际局势。“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被决定性地纳入到以全球为范围的新世界中。与此同时,延续千年的、以地中海东部地区(犹太史)为重心的人类历史叙事最终被打破,欧洲西部在成为新“世界”中心的同时,也成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公认的终点。伏尔泰的《风俗论》就是这一史学潮流的典型代表,并引领史学“现代化”。

第二节 古代西亚史学撰述

西亚古代文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古代两河流域开始的。两河流域又被音译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源自于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即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之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地中海东部滨海山区,向东流入波斯湾。古代两河流域北部为亚述(Assyria),南部为巴比伦地区(Babylonia),后者又

分为北部的阿卡德(Akkad)地区和南部的苏美尔(Sumer)地区。从历史时期而言,古代西亚先有苏美尔文明,后有巴比伦文明,公元前6世纪波斯文明(Persia)取而代之,繁荣了约三百年,继之以马其顿(Macedonia)、塞琉古(Seleucid)等希腊化文明和萨珊波斯(Susania)文明,最后终结于公元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文明。

约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诸城邦蜂起,著名的城邦有埃利都(Eridu)、温马(Umma)、伊新(Isin)、基什(Kish)、舒鲁帕克(Shuruppak)、乌尔(Ur)、尼普尔(Nippur)和乌鲁克(Uruk)等。这些城市多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著名的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是《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主角。传说中发明楔形文字和泥版书写的则是乌鲁克王恩美卡。该王国境内的舒鲁帕克是古代广为流传的大洪水故事的最早流传地。乌尔则是以色列先知亚伯拉罕的家乡,也是著名的乌尔王朝的首府。尼普尔则以神庙著称于其时,现代的许多考古发现都来自于这里。还有传说中的伊甸园的所在地:拉伽什(Lagash)。而基什王萨尔贡(Sargon II,约公元前2340)则创建了阿卡德帝国;等等。先后称霸的有乌尔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600—前2400)、拉伽什王朝(约公元前2500—前2300)、乌鲁克王朝(约公元前2300)、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00—前2100)、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00—前2000)、伊新王朝(约公元前2000—前1800)和拉尔萨王朝(约元前2000—前1800)。

古代西亚最早的历史记述主要包括王表(King List)和各种纪事铭文(Inscription)。王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苏美尔王表》(*Sumerian King List*)。《苏美尔王表》从“王权自天而降”讲起,大体格式包括每位王的王都名、王名和统治年限。在该王朝结束时,有总计,共多少王多少年。^①第一个称王之所是埃利都城邦。历经五个城邦的兴衰,而后有大洪水,导致王权终结。大洪水之后,王权再次“从天而降”,这次兴起于基什,并开

^① T. 雅各布森编:《苏美尔王表》,郑殿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参照格拉斯内英译本校正 Jean-Jacques Glassner, *Mesopotamian Chronicles*, Leiden: Brill, 1993。